

TRAUMA FICTION

创伤小说

安妮·怀特海德 著
李敏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CHUANGSHANG XIAOSHUO

创 伤 小 说

[英] 安妮·怀特海德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 开封 ·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6—2009—1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伤小说/[英]安妮·怀特海德著;李敏译.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2

ISBN 978-7-5649-0247-6

I. ①创… II. ①怀…②李…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世界
IV. ① I 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6188 号

© Anne Whitehead, 2004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22 George Square, Edinburgh

书 名 创伤小说

著作责任者 [英]安妮·怀特海德 著 李 敏 译

责任编辑 麻保金

责任校对 张 珊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90mm×960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77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致 谢

本书第一章的一个版本发表在《评论》上,由海尔瑞夫出版社(Heldref Publications)出版;第二章首次发表在《讲述》上,由韦恩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在一次学术休假期间写成的,这次学术休假是由依托泰恩国内研究会的纽卡斯尔大学和一项人文学科研究学会的学术休假奖联合资助的。感谢莫拉·福利斯特(Moyra Forrest)在索引方面所做的工作,感谢纽卡斯尔大学的英语学院承担了编写索引的费用。感谢杰姬·琼斯(Jackie Jones)——我的爱丁堡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的鼓励、支持和明智的评论,也感谢凯西·卡露丝(Cathy Caruth)和苏·维斯(Sue Vice),她们作为爱丁堡大学出版社的审稿人,在我写作的早期阶段提供了有价值的反馈意见,为引言和结语提供了特别有帮助的建议。我的思考也在和许多朋友及同事的对话中受到激发,其中最突出的是约翰·拜克(John Beck)、凯特·切达卓伊(Kate Chedgzoy)、玛丽塔·丽沃尔·格林姆伍德(Marita Levaul-Grimwood)、乔纳森·朗(Jonathan Long)、迈克尔·罗辛顿(Michael Rossington)和维多利亚·斯图尔特(Victoria Stewart)。特别感谢琳达·安德森(Linda Anderson)对这项计划的鼓励、阅读全书和对本书初稿的评论。萨尔福德大学在2003年5月举办的讨论会:“创伤:叙述、理论、政治”,为我关于第一章的思考提供了素材。感谢艾利卡·伯曼(Erica Burman)、理查德·科瑞恩萧(Richard Crownshaw)和简·基尔比(Jane Kilby),他们严谨而细致地阅读了我

的文稿。卡尔·古德(Carl Good)和安妮·库比列(Anne Cubilie)为修订第二章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建议。最后感谢马克·杰林沃特(Mark Gillingwater),他一直为我鼓劲儿,令我振作。

目 录

致 谢	(1)
-----------	-------

第一部分 主 题

导 论	(3)
1 作为幽灵的过去:创伤和萦绕在派特·巴克的 《另一个世界》中的鬼魂	(13)
2 讲故事:本杰明·威尔科米尔斯基的《片断》中的 创伤与证词	(34)
3 “愿意记住你的土地”:安妮·迈克尔斯的《四处散 落的碎片》中的创伤和风景	(56)

第二部分 风 格

导 论	(93)
4 犹太人聚居区的奥赛罗:卡莱尔·菲利普斯的 《血的本性》中的创伤与互文性	(101)
5 蝴蝶男人:W. G. 塞巴尔德作品中的创伤和重复	(133)
6 重构历史:托尼·莫里森的《爵士》和杰姬·凯的 《小号》中的创伤和即兴创作	(160)

2 创伤小说

结 语 (185)

Bibliography(原文参考文献) (187)

译后记 (196)

第一部分 主题

导 论

“创伤小说”一词描述了一种自相矛盾或冲突的事物：如果创伤包含着一种令人不知所措并抗拒语言或表达的事件或经验的话，那么它怎么能够在小说中被叙述？这一专题试图提出有多种多样思考创伤和小说之间关系的途径。创伤理论的兴起为小说家们提供了新的将创伤概念化的方法，而且使注意力从过去有哪些内容被记住的问题上，转移到它是怎样以及为什么被记住的问题上。这相应地提出了相关的政治、伦理和美学问题。那种试图在多种多样的文化群体间描述创伤或使创伤的历史瞬间可视化具体化的愿望，已经导致了当代小说中许多重要作品的诞生。例如，我们可以想起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在诸如《宠儿》(1987)和《爵士》(1992)这样的小说中，为了使非洲裔美国人在奴隶制存续期间及废除之后所遭受的苦难获得政治上的承认而做出的努力。同样清楚的是小说本身会因为它与创伤的遭遇而留下标记或发生改变。小说家们常常发现创伤的冲击力只有通过模仿它的形式和症状才能得到充分表达，因此时间性和年代学崩溃了，叙事的特征表现为重复和间接性。在自觉的将风格技巧展开为思考或评论的模式这一点上，创伤小说与后现代和后殖民小说相互交叠，并从中多有借鉴。在接下来的部分，我的目标首先是通过致力于探究创伤理论之于创伤被概念化和被理解之方式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反过来在当代小说中是如何被反映的，来思考创伤小说。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我将探究小说家们寻求表达创

伤或者叙述不可叙述之物的文学技巧,我将勾画出表征正在浮现的创伤小说类型的文学技巧的(必然是暂时的)边界轮廓。

“创伤小说”一词还标志着创伤概念近年来由医学和科学话语到文学研究领域的历程。当代创伤研究的起源常常被追溯至 1980 年。当时“创伤后压力失调”(PTSD)首次被纳入医学和精神病学行业的诊断规范。对“创伤后压力失调”的正式承认是越战退伍军人持续不断的举行政治运动的结果,他们组织煽动性的团体反抗战争的持续。这些团体迅速蔓延全美,发挥着双重作用:增强公众对战争后果的了解和为退伍士兵提供支持 with 指导。退伍军人们还委托专门机构研究战争时期的经验对参战人员的影响。这一举措产生了五卷本的关于越战心理遗产的研究成果。它们清楚地勾画了“创伤后压力失调”的综合症,而且证明了它与直面战争的直接关系。在正式将这种情况承认为一种新的诊断类别时,美国精神病学联合会首次承认精神失调可能在整体上被环境所决定,而且发生在成年期的创伤事件可能有持久的心理后果。

创伤理论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出现在美国,它寻求详细阐述创伤的文化和伦理内涵。本书的前三章探究创伤理论家凯西·卡露丝(Cathy Caruth)、苏珊娜·费尔曼(Shoshana Felman)和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的作品。这些理论家都出自耶鲁大学,他们在那里一起工作、一起受教于保罗·德曼(Paul de Man)。他们每个人都令人惊讶地经历了从文学批评转向创伤研究的历程。我认为这些理论家们揭示了文学批评和创伤理论之间那种独特的密切关联,而且暗示出创伤理论通过并不总能被识别的途径,内在地联系着文学。本书将文学文本傍着创伤理论阅读,并非简单地尝试着将一种心理学或精神病学的理论应用于文本。更为深刻的是,我寻求对一种回响做出评论,这种回响产生在理论和文学之间,在一个向另一个说话或宣讲之中。每一章节中的文学性阅读都会增加或说出理论不能说出的某些东西。阅读不是简单的图解理论,而是理论自身沉默的延伸。在本书的全部内容中,理论和文学作品都在相互对话和相互取

代,向读者指示着两种话语之间复杂的和相互补充的关系。

凯西·卡露丝编选的《创伤:探索记忆》一书在1995年出版,该书的面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了强调创伤理论的跨学科本质,卡露丝将文学理论家、电影制作者、社会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论文和访谈组合在一起。在该书导论中,卡露丝总结了产生自“创伤后压力失调”诊断类别的创伤的定义:

病理学仅仅存在于它的经验结构或感受中:事件在当时没有被充分吸收或体验,而是被延迟,表现在对某个经历过此事之人的反复纠缠之中。蒙受精神创伤准确地说就是被一种形象或事件控制。(1995:4~5)

卡露丝的兴趣在于对创伤核心之理解的碰撞。创伤是以这样的形式出现的:它在被感受的时刻,是作为一种引起传统认识论动摇的非经验被铭记的。

卡露丝对创伤的概念化,使经验和事件之间的关系成为深刻的问题。创伤携带着一种使它抵抗叙事结构和线性时间的精确力量。由于在发生的瞬间没有被充分领会,创伤不受个体的控制,不能被随心所欲地重述,而是作为一种盘旋和萦绕不去的影响发挥作用。这种影响不仅持续的、侵入似的重返,而且只有在延迟的重复中才能被第一次经历。在卡露丝看来,创伤作为不稳定的时间结构和个人与世界之间令人烦扰的关系,代表着一种深刻的历史危机:

如果创伤后压力失调必须被理解作为一种病理学上的症状,那么它与其说是一种无意识的症状,不如说是一种历史的症状。我们可能会说,受创伤者在自身中携带着一种不可能的历史,或者说他们自身成为一种他们不能完全控制的历史症状。(1995:5)

卡露丝关于一种历史经验危机的清晰表达,与那些断裂的故事和破碎的生命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它们产生自最近的创伤事件的废墟之上。卡露丝聚焦于创伤的结构,有意地冒着被指责在一种可归纳的条件下丢失事件细节的风险,但是她的工作远非寻求减小或降低苦难,而是代表着一种思考必然内在于创伤的裂缝和混乱的重要尝试。

卡露丝对创伤的时间和历史断裂的强调吸收了弗洛伊德的概念“事后性”(Nachträglichkeit),这个概念被翻译为“延迟行为”或“后发行为”(afterwardsness)^①。“事后性”描述了一种复杂而又含糊的时间轨迹,被证明是一种对那些(像卡露丝一样的)人有用的模式。他们寻求重新思考记忆和创伤之间的关系,建构背离绝对线性的历史时间的模式。对弗洛伊德来说,这一概念指的是在最近时期,为了符合新鲜的经验或者一个新抵达的发展阶段,某些经验、印象和记忆的痕迹被修订的方式。弗洛伊德的概念包含着一种对记忆的偶然性和暂时性的激进的重新思考。创伤事件在它发生之时没有被充分认识到,只是在后来的一些强烈的情绪危机点上成为“事件”。卡露丝对创伤的理解将“延迟行为”修改为“延迟性”,仿造弗洛伊德针对过去的非直线型时间关系的概念,建构了自身。

在第一章,我探究了卡露丝的创伤概念化对于叙述作品的含义。她的作品提出,如果创伤完全可以接受叙述的规划,那么它就需要一种与传统的直线顺序分离的文学形式。一个时间突然闯入另一个时间被卡露丝塑造为一种占据和缠绕的形式。鬼魂是时间断裂的恰当体现,是过去在当下的浮现。在当代小说中,有大量作品探究鬼魂出没的历史,未解决的往事的痕迹,或者那些死得太突然、太暴力以致

① 弗洛伊德与“事后性”概念有关的重要文本有:“一个5岁男孩的恐惧症的分析(小汉斯)”(弗洛伊德,1990,VIII:165~305)和“来自婴儿期神经官能症的历史记录(狼人)”(弗洛伊德,1991,IX:227~366)。关于这个概念的更进一步的讨论,可以参看拉普朗什(Laplanche)(1999)和拉康(Lacan)(1985:30~113)。

于没有得到适当哀悼的鬼魂,纠缠着那些正在寻求好好活着的人们。托尼·莫里森的《宠儿》是这些小说中最有影响的。塞丝(Sethe)被她的遭到谋杀的女儿——比拉伍德(Beloved)的鬼魂缠绕着,她返回来索取她曾非常粗暴的拒绝过的母爱。比拉伍德还象征着奴隶制的未解决的创伤,它一刻不停地缠绕着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难以消除。在米歇尔·罗伯茨(Michele Roberts)的《豪斯的女儿们》(1993)和安妮·迈克尔斯(Anne Michaels)的《四处散落的碎片》(1997)中,在大屠杀中被杀害的犹太人没有得到适当的安葬,他们的鬼魂总是返回来在下一代人中间闹鬼。

派特·巴克(Pat Barker)获得布克文学奖的作品《再生》三部曲(1991~1995)探究了作为鬼魂出没之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小说证明除非过去得到成功的处理,否则再生是不可能的。在第一章,我聚焦于巴克的《另一个世界》(1998),这是《再生》三部曲的续篇。小说揭示了在千年之交,伟大的战争还没有显示出被淡忘的迹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兵乔迪(Geordie)在他的噩梦中,被弟弟哈里(Harry)的鬼魂和他的未能解决的死亡后果困扰着。故事的结尾看起来暗示着在乔迪死后,过去就能被化解和遗忘。但是,我的阅读指出结尾的安慰提供了一种手段,籍此,巴克评价和批评了我们对一种易于被包装和被消解的过去的需要。我认为小说提供了一种作为幽灵的历史版本,在其中战争的后果远未结束。而在当代小说中,鬼故事被重新改写以探究创伤作为精神着魔的本质。鬼魂具体表达或实体化了新近的历史创伤,代表了一种集体和文化困扰的形式。小说提出了过去的鬼魂能否被驱散的重要问题。精神分析学宣称它能够解决过去,使鬼魂离开。但是,许多小说含蓄地批评了这种观点。正如约翰·布兰尼根(John Brannigan)指出的,当代小说中的鬼魂出没,常常代表着历史上沉默的或在文化上被排除的因素的象征性返回。驱散这些鬼魂的尝试可能象征着“一种延长压制抗议或异质声音的尝试”(2003:21)。

如果在卡露丝的作品中创伤是作为一种“真相的危机”(1995:6)

出现的话,那么这种危机扩展至个人之外,影响到历史经验在文化层面上被抵达的方式。创伤内在的延迟效果能够在证词叙述的破碎或碎片化特征中被辨别出来,这种叙述需要新的阅读或接受结构。20世纪80年代见证了大屠杀录像证词类型出现,这种录像证词起源于纽海文,并很快被耶鲁大学图书馆接收存档。在《证词:文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中的见证危机》中,苏珊娜·费尔曼(Shoshana Felman)和多里·劳伯(Dori Laub)详细阐述了历史见证的当代危机,这种见证使一种深刻的伦理反应成为必需。面对担负着创伤的不连贯性之压力的叙述,费尔曼和劳伯坚持认为在证词开启的新的空间中仍然有传递真相的可能性。作为超出了理解范围的言说,证词要求说者和听者之间的一种高度合作的关系。听者承担着一种双重责任:去接收证词,而且要适当地避免将故事作为他或她自己的故事。在充满同情的见证证词不能充分表达的内容的需要,和一种同时发生的对经验的他者性的尊重之间,产生了一种脆弱的平衡,这种尊重抗拒着使经验太过熟悉或沉溺于太过容易的理解或识别。

证词所引发的伦理问题是固有的文学问题。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注意到创伤理论家正在试图寻找“一种接收故事、倾听故事、将故事拉入一种解释性对话的途径”(1995:541)。在文学研究中,阐释常常被看做是一个二元的过程,它发生在主动的主体(读者)和被动的客体(文本)之间。创伤理论重新调整了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因此阅读被重建为一种伦理实践。哈特曼认为文本把读者定位为一种“反应良好的、敏感的,甚至不可预测的存在物”。这种新的阅读和倾听模式转而发展为关心公众心理健康问题。创伤研究通过劝告从医者去留意一种没有得到充分理解或不可理解的声音,去举证,以此来反对医学的简化主义。专家们并没有被赋予最后的决定权,相反的,他们的职责是回到患者(他的或她的)自己的故事中。

安妮·迈克尔斯的《四处散落的碎片》一书中为读者提供了一种见证过程的模式。正如尼古拉·金(Nicola King)所指出的,小说是

围绕着举证的不同层面或者水平建构而成的：阿索斯(Athos)倾听和接收了雅各布(Jakob)的证词；这使得雅克布能够书写他的回忆录，回忆录被班(Ben)发现和阅读，并和读者一起分享。W. G. 塞巴尔德(W. G. Sebald)的叙述采用了一种相似的结构。在《奥斯特立兹》(2001)中，叙述者从奥斯特立兹那里接收证言已经多年。在记录和写下故事时，他既将它归还给了奥斯特立兹，也同时将它传递给了读者。这两部小说都把语言和讲述故事的功能置于最显著的位置。它们创造了一种暗中包含读者在内的见证者团体，因此恰恰是阅读行为构成了一种作证的模式。同时，小说家将叙述人定位为他人故事的中介者，因而发现了一种表达经验的途径，这种经验并不直接属于他们本人。但是，在这些叙述中存在着挪用的风险。比如在《奥斯特立兹》中，塞巴尔德极具特色地省略了小说中的一些段落和引用标记，这就可能模糊了奥斯特立兹和叙述者之间的区别。

随证词而来的难题或困境是如何避免使同情演变为过分认同。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曾尝试通过区别移情和认同在二者之间建立一条分界线。移情作用把和他人之间的融洽或联系与对他者性的认定结合起来，它强调“认识和批评分析”(2001: 213)的重要性。认同未能识别这些界限，证言的接收者屈从于一种二次创伤。拉卡普拉的模式发出了反对挪用另一个人的经验的重要警示。在第二章中，我通过阅读本杰明·威尔科米尔斯基(Binjamin Wilkomirski)的《片断：童年回忆录(1939~1948)》(1996)来探讨创伤的可传递性。威尔科米尔斯基的回忆录代表着大屠杀研究中的一个危机点，因为该书在出版之后被揭露出是一部赝品，“威尔科米尔斯基”是一个假名。《片断》的作者实际上是瑞士的一位乐器制作师，名叫布鲁诺·道赛柯(Bruno Doessekker)^①。威尔科米尔斯基不是有意生产一部赝品的；他显然相信他描述的经验就是他本人的。他对

① 依照其他的评论，我在本书中采用惯例，认为《片断》的作者是威尔科米尔斯基(Wilkomirski)。

大屠杀回忆录和证词的内在化表明了创伤的可传递性,同时也意味着过分认同的危险。在设定幸存者的身份时,威尔科米尔斯基超越了拉卡普拉设置的界线。拉卡普拉恰当地认为被传递的创伤经验应该与幸存者所经历的创伤区别开来。但是,这种区分有将威尔科米尔斯基的叙述中得失攸关的问题简单化的风险。虽然他不是一个大屠杀幸存者,但是他确实在父母早逝和随后的被收养过程中体验了创伤。威尔科米尔斯基的案例提出了一个令人忧虑的、复杂的问题,这就是如何思考不同类型和水平的创伤之间的关系。

我阅读《片断》是试图证明威尔科米尔斯基严密地复制了与证词类型相联系的文学技巧。他创造了一种到处是裂隙的叙述,这些裂隙由读者用他们自己的关于大屠杀的知识加以填补。读者可以自由地使用提喻法和现在进行时态。威尔科米尔斯基对证词规范的复制使他能够创造一种具有高度说服力的创伤叙述,这种叙述含蓄地将读者定位为一个具有同情心的听众或证人。但是,在叙述者对儿童视点的采用上,《片断》显著地背离了见证模式。我认为威尔科米尔斯基对这种技法的运用受到了杰泽·科辛斯基(Jerzy Kosinski)的《彩色鸟》(1965)的影响。虽然科辛斯基将《彩色鸟》作为小说出版,但他——和威尔科米尔斯基一样——展现了一种将自己的小说内化为他的自我创造过程的一部分的明显倾向。我对《片断》的阅读还探讨了威尔科米尔斯基的“回忆录”出版的直接背景,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瑞士发生的与国家卷入大屠杀有关的记忆危机。我提出威尔科米尔斯基文本的原初冲击力,至少部分地来自它为瑞士读者提供了一种通过一个流亡儿童的目光观看他们自己的陌生化视角。

在对可传递性概念进行思考之后,哈特曼对创伤知识如何“能够……伸展到个人的和文化的记忆”(1995:552)提出了疑问。他的回答利用了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诗歌来强调地点的重要性。哈特曼(Hatman)在最后一次儿童运送中被从德国疏散到英国,他把他对华兹华斯的喜爱和他作为一个来自发生在欧洲